

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

西北大学出版社

彭树智 著

●第三世界的崛起，是当代世界的头等大事。本书用逆向追溯的方法，研究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亚非拉民族主义运动史；又用类型分析方法，研究了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运动、政治运动和改革运动；同时也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孙中山、凯末尔、甘地、塔尔齐、扎萨汗、柴鲁尔、阿布德·凯利姆、海尔·塞拉一世、桑地诺和卡德纳斯等人的历史作用。本书展现了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结合的广阔历史图景。

K15

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

彭树智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036028

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

彭树智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太白路)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5 字数300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604—0029—9/K·9

书号：11320·19 定价：2.80元

目 录

绪 论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的 类型分析	(1)
第一章 印度的非暴力抵抗运动	(18)
一 甘地和甘地主义	(18)
二 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准备和序幕	(31)
三 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第一阶段：非暴力不合作 运动	(41)
四 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第二阶段：群众性的非暴 力公民不服从运动	(50)
五 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第三阶段：个人的非暴力 公民不服从运动	(62)
第二章 凯末尔革命和土耳其的复兴	(76)
一 凯末尔和凯末尔主义	(76)
二 凯末尔革命	(80)
三 世俗化改革	(91)
四 “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	(108)
五 革命和改革的意义	(117)
第三章 阿富汗第三次抗英战争和阿马努拉政府的 改革	(128)
一 现代阿富汗的社会经济关系	(128)

二	1919年的独立战争	(134)
三	现代化改革	(134)
四	阿马努拉政府与苏俄的关系	(156)
第四章	伊朗的反帝运动和礼萨汗的改革	(168)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伊朗社会	(168)
二	大不里士的希阿巴尼派起义	(178)
三	吉朗共和国	(185)
四	礼萨汗的政变和改革	(195)
五	礼萨汗的对外政策与民族主义思想的特征	
		(209)
第五章	埃及的华夫脱运动	(217)
一	英国在埃及的殖民保护制度	(217)
二	柴鲁尔和华夫脱党	(223)
三	埃及的三月起义	(230)
四	1922年宪法	(241)
五	华夫脱党的护宪运动	(248)
第六章	摩洛哥里夫部落的抗争	(262)
一	摩洛哥沦为法国和西班牙的半殖民地	(262)
二	西班牙的侵略	(268)
三	凯里姆和里夫共和国	(270)
四	里夫人民的抗西抗法战争	(278)
五	法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立场	(287)
第七章	埃塞俄比亚的抗意战争	(293)
一	青年埃塞俄比亚派的兴起	(293)
二	海尔·塞拉西一世的改革	(302)
三	“阿比西尼亚危机”与国际关系	(306)

四	抗意战争的三个发展阶段	(322)
五	抗意战争的历史地位	(340)
第八章	桑地诺的抗美游击战争：	(350)
一	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	(350)
二	1926年的立宪战争	(355)
三	抗美游击战争的序幕	(361)
四	抗美游击战争的进程	(368)
五	谈判和遇害	(382)
六	性质和意义	(392)
第九章	墨西哥的护宪运动和卡德纳斯的改革	(401)
一	1917年的墨西哥宪法	(401)
二	墨西哥的护宪运动	(404)
三	卡德纳斯的改革	(409)
余 论	现代和当代民族主义运动的连续性和 继承性	(422)

绪 论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民族 民主运动的类型分析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多年，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史上，是一个很有特征的历史时期。

这个时期上承1905—1913年“亚洲觉醒”时期的民族民主运动的余波，下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开端，形成了内部的各个不同的独特阶段。

亚非拉是一个由于共同原因而遭受同样苦难经历和由于共同目的而面临同样历史任务的统一体。亚非拉地区又是一个地域无比辽阔、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多元体。对待这个既具有统一性、也充满着多元性的变动激烈的世界，决不能用一个模式去到处套用。

类型分析无疑是寻找解决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多样化发展的途径之一。这种分析将展现出这种运动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及其发展的历史趋向。本书试图用这种分析方法，研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民族民主运动史。

首先，类型分析有助于对亚非拉民主革命运动特点的理解。

熟悉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的人都知道，列宁在俄国十月革

命以后，坚决反对用俄国革命的模式去铸造东方的革命运动，坚决反对用欧洲的观点去观察东方的革命运动。他尖锐地指出：“我们欧洲的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①列宁这些话是指亚洲地区而言的，但其思想实质不仅适用于非洲和拉丁美洲，而且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历史辩证法，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在。它为我们分析两次两界大战之间亚非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类型，提供了一个指导思想。

亚非拉不同于欧洲的基本特点，是社会经济结构、阶级结构的复杂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力量的多样性和这种革命运动的多类型性。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辽阔的亚非拉地区，社会经济关系要比欧洲复杂得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远非欧洲所能比拟。在一些国家中，资本主义关系有了较大发展，产生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形成了两大阶级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即使是这些国家，也与欧洲国家有着悬殊的差异。在另外一些国家中，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资本主义关系比较薄弱，但资产阶级还有较多政治经验，而无产阶级却不能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还有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更为落后，封建宗法关系、甚至原始部落经济占着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产生。面临着这种实际情况，必须具体分析各国国情，然后加以综合归纳，深入探讨这个地区革命运动不同于俄国和欧洲革命的“更多的特色”。

亚非拉国家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

地。这个最基本的客观事实决定了各国的革命运动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打击帝国主义及其支柱封建主义，因而都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在人类历史上，反帝运动是最能把更广大爱国阶层吸引进来的人民革命运动。不同阶级和阶层不仅都在一定条件下参加反帝运动，而且各个爱国阶级和阶层，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举起反帝的旗帜，领导民族民主运动。

综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的民族民主运动，从领导力量上看，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五个类型^①。

第一个类型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它集中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新的历史时期和总的趋势。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经历了建党初期、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发展阶段，在探索和实践中走出了中国革命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属于这个类型的，还有越南、朝鲜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第二个类型是以土耳其为代表的、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是大量的、普遍的，但最有代表性的是土耳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土耳其之所以有代表性，首先在于凯末尔革命的结果建立了民族独立国家——土耳其共和国。这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建立起的唯一的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国家。这是民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取得胜利的标志。其次，土耳其革命后，土耳其政府

又进行了十几年的民族化、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些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具体效果，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它提出并寻求解决民族独立国家面临的发展民族经济、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新历史课题。最后，在革命和改革过程中，形成了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凯末尔主义。从这三点看，土耳其确有代表性。仅次于它的，是印度的民族民主运动。

第三个类型是以尼加拉瓜为代表的、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小资产阶级在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中的作用问题，是值得研讨的课题。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经常站在亚非拉革命运动的前列。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不但是革命运动的宣传者、组织者，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为革命的领导者。领导伊朗真盖尔运动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就是一例。尼加拉瓜的桑地诺领导的抗美游击战争，则是它的突出代表。桑地诺运动的纲领，是用武装斗争来拯救民族的荣誉、恢复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桑地诺本人在晚期为正义的社会理想而做的实验中，提出了“人人有工做、有活干”的口号。他的浩气常存的战斗反映了一位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家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事实。

第四个类型是爱国封建贵族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属于这个类型的有两个国家。第一个是阿富汗的封建贵族知识分子及其政治代表组成的青年阿富汗派。这个爱国派别的政治纲领是实现国家完全独立、实现现代化改革和建立君主立宪国家。在经济落后的具体条件下，在阿富汗既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无产阶级的情况下，青年阿富汗派举起民族民主旗帜，领导了1919年的抗英独立战争，接着又领导了10年的改革运动^②，第

二个是以海尔·塞拉西一世为代表的青年埃塞俄比亚派。这个爱国的封建贵族政派也曾进行了政治、行政、军事、教育、社会和经济改革；但它最著称的业绩，是领导了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抗意战争，从而以爱国封建贵族领导民族民主运动的独特类型而载入亚非拉现代史的篇章。

第五个类型是爱国部落酋长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出现这个类型的条件在于三个相互联系的因素：经济发展特别落后、没有新的阶级和面临帝国主义的侵略。北非摩洛哥的里夫部落就是这种情况，阿布德·凯利姆就是这样的爱国部落酋长。他的政治纲领反映在六条《民族誓约》中。建立完全独立的里夫共和国，是他斗争的目标。武装抗击法国和西班牙侵略者，是他的主要斗争形式。他还进行部落酋长制、军事体制、国家政权等方面的改革。特别是他领导的里夫部落人民反对西班牙和法国帝国主义的独立战争，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增添了一个独特的类型。虽然只有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但它毕竟是自成一个类型的。

这些类型的多样性在民族民主运动的共性方面，表现了它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同时，这些类型的多样性都具有时代的鲜明特色。无产阶级领导型的自不待言，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型的各种运动也无不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小资产阶级领导型比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型更激进、更靠近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就是贵族知识分子、封建国王和部落酋长，也不是20世纪以前的那个模式了。他们都受着新时代潮流的薰陶，具有某些资产阶级民主的因素，力求在允许的范围内，实现其所追求的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目标。

对于非无产阶级领导型的民族民主运动，除了从反对世界

帝国主义这个总的革命斗争决算中去估计它的进步意义之外，我们还应当从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实际出发，进行客观的和深入的分析。阿富汗王国实行类似欧洲18世纪的开明君主制，对不发达的阿富汗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我们不应该以经济发达国家的尺度去衡量它。凯末尔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走上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自然是一个进步历史现象。我们也不应该以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标准去苛求它。总之，民族资产阶级、爱国封建贵族和部落酋长型的运动，尽管是违背了形式民主的要求，但是“在经济学的形式上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能是正确的。”^④列宁非常重视恩格斯这句名言，要求马克思主义者记住这个深刻的原理，并把它运用到“20世纪产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许多亚洲国家”^⑤的实际中去。对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亚非拉非无产阶级领导型的民族民主运动，也应当作如是观。

其次，类型分析有助于对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改革运动的理解。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地区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内容是丰富多姿的。它决不是单一的政治运动。改革运动就是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亚非拉的民族独立国家来说，改革运动的意义决不下于政治运动。它涉及到用经济独立巩固政治独立、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和建立繁荣富强的民族国家的问题。

建立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历史发展趋势来说，最早出现于受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压迫下的拉丁美洲。到了19世纪下半期，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历史趋势，在亚洲和非洲地区，日益迫切地提上了历史

的日程。亚洲首当其冲。受欧美殖民侵略威胁的日本，最早建立了民族独立国家，但很快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国家，从而脱离了亚洲民族民主运动而同欧美列强并驾齐驱。1905—1913年的“亚洲觉醒”是20世纪初期兴起的规模巨大的民族民主运动，它的总趋势是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民族民主运动的深入之处，就在于把改革运动作为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重要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相继提出并探求解决经济发展的途径。

两次大战之间亚非拉的改革运动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在同一时代的条件下，各地区因长期形成的历史、民族、文化、宗教、心理和习俗的不同，在改革的目的、内容、方法等方面而表现出自己的特色。在同一地区内，也同样由于上述因素而表现的相对稳定性，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各自区别的一面。但是，从总体上看，地域性特征成为类型分析的主要依据。

这个时期的改革运动可分为三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是中东地域型的改革运动。

中东地域型的改革运动由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1923—1938年）、阿富汗的阿马努拉改革（1919—1929年）和伊朗的礼萨汗改革（1925—1937年）这三大改革运动组成。中东地区是伊斯兰文化圈的中心地区。现代化改革都要触及伊斯兰传统文化。因此，世俗化成了这三大改革运动的共同点。中东三个国家都是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尽管国家形式不同，但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改变经济落后面貌、巩固政治独立，因而现代化和民族化就构成了它们改革的基本特点。

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是中东地域型改革运动的原型和代

表⑤。阿富汗和伊朗的改革大体上采用了凯末尔的模式。但凯末尔改革是在1918—1923年民族革命战争的基础上进行的。土耳其又处于欧洲和亚洲的交界处，伊斯兰文化圈和欧洲文化圈的交错冲突，使土耳其同其他中东国家的改革表现为不同的深度。这不仅表现为民主共和制方面，而且表现为废除“哈里发制”的宗教与政治分离、宗教和司法分离、宗教和教育分离等世俗化运动方面。1928年，土耳其宪法中删去了“伊斯兰教为土耳其国教”的条文，同时又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土耳其作为一个世俗国家而长期屹立于中东伊斯兰文化圈的中心地区。这是件了不起的事。今天的土耳其，居民的98%是穆斯林；而它依然是一个世俗国家。对改革固定下来的成果，国外的观光者都为此赞叹不已。

凯末尔改革的民族化和现代化也比阿富汗和伊朗强烈。例如在文化改革方面的文字改革工作，即废除阿拉伯字母拼写土耳其语而开展的拉丁字母化运动，就是企图摆脱阿拉伯文化的影响；把土耳其历史作为各级学校的课程，都是为了发扬民族意识，振奋民族精神。凯末尔实行的民族国家资本主义改革，不但重视振兴工业，而且还吸取了苏联计划经济的经验，从而证明它不单纯是西方式的现代化改革。至于社会习俗方面的改革，也体现了它破除封建迷信和提倡科学的现代化精神。

同凯末尔改革相比较，阿马努拉在阿富汗的现代化改革则是失败的改革⑦。由于阿富汗社会发展水平的极其落后，没有形成一个现代化的政党来领导这一场改革运动，没有一个切合实际的总体设想和执行方案，以及机械模仿、急躁冒进，终于导致了改革的失败。对军事改革的虎头蛇尾，导致了阿马努拉政权的垮台。礼萨汗在伊朗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功。他的行政

改革促成了国家的统一。他的经济改革也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他的法制改革则把欧洲式的法典引进到伊斯兰教神权的封建伊朗社会中来。他的社会习俗改革表现了世俗化和现代化精神。但是，他的民族化却渗透了复古主义和大伊朗主义精神，并有强烈的反共倾向。

中东三次改革运动无论成功或失败，无论各自有什么不同，都在世俗化、民族化和现代化方面体现着它们地域性类型的特点。

第二个类型是北非地域型的改革运动。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北非地区出现了三次改革运动。这就是柴鲁尔在埃及的改革（1924年1月—11月）、阿布德·凯利姆在里夫共和国的改革（1921年9月—1924年10月）和海尔·塞拉西一世在埃塞俄比亚的改革（1930年11月—1935年10月）。

在这三次改革运动中，柴鲁尔的改革时间最短，改革的条件却和里夫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大同小异。当时埃及面临着英国侵略的严重威胁，柴鲁尔内阁存在的十个月的短暂时间中，解决英埃关系问题占去了它的大部分时间。为了加强民族主义实力以对抗英国侵略，他把埃及政府的民族化放在重要地位。他也整顿了管理体制和重视对教育的拨款。但他在经济改革上没有重大建树，而且完全忽视了军事方面的改革。柴鲁尔内阁是在既无军队支持、又无人民依靠情况下倒台的。

凯利姆建立的里夫共和国是一个很独特的民族独立国家。在里夫部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凯利姆的“现代的、民族的、欧洲式国家”目标差距极其悬殊的情况下，总统制、内阁制、议会制只能是部落人民的陌生的初级课程。改革的起点很低，保留了原来的部落酋长制，只是限制了酋长的权力以加强中央

集中的行政管理。凯利姆改革把重点放在军事体制的调整和国内秩序的整顿上。他建立了一支统一的军队来代替分散的部落武装，并整顿了无政府状态。这表明他的改革意识同保卫民族独立国家的民族意识融合在一起。面临的西班牙和法国严重侵略的威胁，使他不得不迫切意识到这一点，从而从事于一些防御急需的改革。

海尔·塞拉西一世的改革是北非三次改革中最大的一次改革。改革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保卫民族独立国家而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根本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集权制，消灭封建分裂局面。1931年的帝国宪法是以日本宪法为蓝本，把过去的习惯法用法律形式加以固定化和制度化。他的废奴运动、取消对农民的苛捐杂税制、经济改革、文化教育改革和军事改革、反映了广大人民图强求存的愿望，也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次改革和其他两次改革一样，被外国的入侵和干涉所打断了。

总之，北非的三次改革在时间的跨度上较大。里夫共和国和埃及的改革，基本相近。埃塞俄比亚的改革已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但改革在面临着帝国主义干涉和侵略的严重威胁，它们都缺乏一个和平的国内外环境。帝国主义不允许这些民族独立国家的存在，更不允许它们改革取得成就。

第三个类型是拉丁美洲的墨西哥的改革。墨西哥的改革是在卡德纳斯总统任内（1934—1940年）进行的。墨西哥和亚非拉许多国家不同之处，在于它1910—1917年间经历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在时间上正好把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史上的“亚洲觉醒”（1905—1913年）到俄国十月革命后的革命风暴期间的空白填补起来。这次革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作为革命成果的1917年宪法是当时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宪法。

卡德纳斯改革最基本的特点，在于它是围绕着1917年墨西哥宪法而展开的护宪运动的继续和发展。1917年宪法的第27条和123条涉及到革命的主要问题，即土地问题和工人权利问题。革命后，国内外反动势力竭力阻止这两个民主条文的实现。因此墨西哥人民为实施宪法而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斗争。卡德纳的土地改革证明，他是认真执行宪法第27条民主内容的总统。他的国有化运动也表明，在实施宪法第123条民主内容方面也是最彻底的。他的教育改革也是深入实施宪法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次改革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改革。由于它全面实施了1917年宪法，因而构成了墨西哥护宪运动的最辉煌的阶段。就它的深度和民主性而言，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亚非拉改革运动所仅有。

这些遍及亚非拉的七次改革运动尽管因地域不同而分为三个不同类型，但总的基点是相同的。这些基点是：第一，前提必须是建立了民族独立国家，没有这个政治前提谈不上实行改革；第二，改革的根本问题是民族独立国家存亡富强问题；第三，改革的内容主要是现代化、民族化和民主化，而从巩固民族独立国家的趋势而言，则与亚非拉各国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密切相关的。

最后，类型分析对于亚非拉的民族主义思潮的研究，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亚非拉的民族主义思潮是一种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和发展自主的民族经济的进步的思潮。它发轫于19世纪初期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期，席卷亚洲大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它以现代的面貌出现在亚非拉地区，成为民族民主